

忠实之后:译者责任的皈依

陈严春

(广东科技学院 外语系,广东 东莞 523083)

[摘要]翻译素有“忠实”之说,而译文忠实之后存在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译文忠实之后的空间关系指向译文忠实的背后、背景或基础之根本问题;译文忠实之后的时间关系指向译文实现忠实的效果后,在时间上或在次序上走向顺达或文雅或顺达与文雅的过程。译者责任是译文忠实之后的皈依,它调和了译文忠实之后的时空关系,使翻译回归沟通交流之本意。

[关键词]忠实;时空关系;译者责任;皈依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7)04-0112-04

After Faithfulness: Reliance of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CHEN Yanchu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ngguan Guangdong 523083, China)

Abstract: Faithfulness is always mentioned in translation and there are spatial relationship and time relationship after faithfulnes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after faithfulness refers to the basic factors, such as the background or foundation in translation; the time relationship after faithfulness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expressiveness or elegance or both of them in time or sequence after the translation realizes faithfulness.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is the reliance after achieving faithfulness of the translation and it harmonizes the time-space relationship after faithfulness, and brings translation back to its original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faithfulness; time-space relationship;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reliance

翻译是人类一项古老的活动,由来已久。据考究,无论是西方译事之举还是东方译学之动,均已历时两千余年。追源溯流,西方译事,除《圣经·旧约》的希腊语翻译外,主要包括古罗马时期的拉丁语翻译,自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共和国中期起至今。^[1]东方译学,主要聚集在中国、印度以及古时的波斯地区。中国,译学产生于六朝至宋代的佛经翻译,发展于明、清之际的科技、宗教翻译,成就于五四运动,并一直延续当下。^[2]

纵观翻译发展历程,其译事活动之纷繁交替,译者之人才辈出与译论之色彩斑斓,无不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几千年的翻译活动却躲不开、绕不过“忠实”之说。事实上,围绕翻译“忠实”的讨论、辩

解、辩论,甚至是争论以及建构、重构、解构和消解,始终不绝于耳。对于翻译“忠实”的研究,凡人俯拾即是。于是乎,文章无意追究“忠实”是否为评定翻译译文好坏的金科玉律,甚至是“乌托邦”“理想王国”“神话”之翻译宗旨和标准的争辩,此乃劳而无功、功而无获、徒劳无功罢了,因为笔者自从接触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以来,一直也将矢志不渝地认定“忠实”为判断翻译译文好坏的第一要义,这如同笔者认定子女必须毫无怨言地认定父母为其生命首要给予者一样,舍其又能逐谁呢?因此,文章谈论的不是何为忠实,而是忠实之后中的“后”为何意、忠实之后与译者责任的关系为哪般以及译者责任

收稿日期:2017-04-21

作者简介:陈严春(1984-)男,广东湛江人,广东科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如何生成的问题。

一 忠实之后的诠释

忠实之后的诠释主要聚焦于“后”字、“之”字和“之后”词组的释义,目的是阐述与“忠实”的关系,为探究译者责任皈依预设前提条件。

“后”字,古语或繁体为“後”字。《汉语大字典》对“后”字的释义不少于20条,其中较常用的有5条,分别作以下之解:

- (1)上古时期对君主的称呼,如:“商之先后”;
- (2)帝王的妻子,如:“皇后;太后”;
- (3)空间的背面,反面的,与“前”相对,如:“后面;背后”;
- (4)次序,与“前”相对,如:“后排;后十名”;
- (5)时间较晚,与“先”相对,如:“日后;后期”;

“之”字,古语中通“也”字。《汉语大字典》对“之”字的释义也不少于20条,其中用法较多的有以下几条:

(1)作为结构助词,表示领有、连属关系,如:“赤子之心”;表示修饰关系,如:“缓兵之计;莫逆之交”;用在主谓之间,使成为句子成分,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2)作为音节助词,虚用,无所指,如:“久而久之”;

(3)作为代词,代替人或事物,如:“置之度外;等闲视之”;等同“这、那”,如:“之二虫,又何知”;

(4)作为动词,往、到,如:“吾欲之南海”;

“之后”词组,一作“……的后面”;一作“以后”。《汉语大字典》对“之后”字的释义为:

- (1)表示处所、物体的后面,如:“背的后面”;
- (2)表示时间的后面,如:“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3)单独用在句子头上,表示在上文所说的事情以后,如“之后便怎么样呢?”

根据以上“后”字、“之”字和“之后”词组的释义,如果进行自由组合,“忠实之后”存在多种不同的诠释。文章选取其中两种,即:忠实的背后(指物体的后面)和忠实的后面(指时间的后面)为主要诠释,指向译文的忠实与译者责任的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换言之,译者责任是译文忠实的基础,译者责任的缺失必然导致译文忠实的缺位,不忠亦不实,结果是译犹未译。同理,译文实现忠实、准确这一基础目标之后,在寻求更高目标时,即译文的通顺和文雅,译者责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二 忠实之后的空间关系以译者责任为皈依

皈依是佛教用语。“皈依”两字,从字面上解释,“皈”是回转之意,或是皈投之意;“依”可作依靠之解,或是信赖之解。责任(respondo)在拉丁文中意为“我作答”,即对外在要求的自主回应。对于译者而言,责任首先意味着译者因身份而获得的规定性义务;其次,责任是译者行动方式的自由意志选择;最后,责任还是对译者行动后果的追究。^[3]译者责任,主要指译者在整体翻译活动中要负起“责任”,即译者有责,译者负责,译者尽责。^[4]忠实之后的空间关系指向忠实的背后、背景或基础之根本问题。换言之,是谁在文本的背后促成了译文的忠实?是作者还是读者?显然不是,而是隐身的译者。^[5]那么,隐身的译者怎样实现译文的忠实?这是以译者责任为皈依的结果。

一是忠实于原文是译者责任的必然。千百年来,随着翻译实践的日新月异和翻译理论的层出不穷,无不证实忠实的背后实质是译者责任的操控。在中国,远至东汉的安清,符秦的鸠摩罗什,东晋的释道安,唐代的玄奘,在翻译佛教时均力求存真。唐人玄奘虽有“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之说,但其“五不翻”的论述却更能体现其力求忠实为首义,体现了其不乱译行为,本质上讲,是遵循了译者责任要求,即:译者不但要遵循另一个人的想法,而且尽可能地按照他组织材料的方式,说话的方式行文。^[6]鲁迅曾指出,在通顺与忠实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鲁迅正是基于其新文化时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提出这一论述,再次证明译者责任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操控译文的忠实。现有彭长江、曹明伦等人专门撰文论述译文的忠实为评定译文好坏的根本。当代学者旗帜鲜明地捍卫了译文的忠实为评定译文好坏的根本,这也是译者责任的表现之一。其实,国际译联在《翻译工作者章程》中早已指出:“译文应忠实于原文,准确表现原作的思想与形式是翻译工作者应尽的道德与法律义务。”^[7]既然是道德又是义务,那么译者责任当之无愧是译文忠实于原文的皈依。

二是忠实于读者是译者责任的使然。严复的“信、达、雅”鲜明地指出,译事不仅需要信(忠实)、而且还要达(顺达),甚至雅(文雅),其中达与雅实际上要求译文忠实于读者。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在翻译实践中,严复常常注重“雅”字,“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则是

严复强调译文忠实于读者的最好写照。傅雷的“神似”说或许更能说明这点。他认为:以效果而言,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于形似而在于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说也要求译文走向读者。在西方,不乏有译学之大家以自己的论断强调译文忠实于读者,彰显强烈的译者责任意识,如尤金·奈达就提出“让作者靠近读者”之说。不管是严复,或是傅雷还是钱钟书,甚至是尤金·奈达,其强调译文忠实于读者的观点,实质昭示了译文忠实于读者是译者责任的使然。换言之,译者责任是译文忠实于读者的依靠。

三 忠实之后的时间关系以译者责任为皈依

忠实之后的时间关系指向译文实现忠实的效果后,在时间或次序上走向顺达或文雅或顺达与文雅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皈依仍是译者责任。

译文的顺达,译文的文雅或者译文的顺达与文雅源于译者之手的现象不胜枚举。究其根本,实乃译者责任之作。清末民初是中国正处于新老思想交替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危及关头,而此时,不少有识之士背负救亡图存之深明大义,日夜焦灼,希冀引入西方思想,改造濒于灭亡边沿的封建社会。严复便是当中一位,他正是在此种背景下深入思考、探索,在洞察自己背负的历史责任之后,他将自己的智慧与学识在《天演论》的翻译中自然贯通,使广大的知识分子“从中得到‘怵焉知变’的危机感、‘自强保种’的使命感、‘合群’及强化社会结合的责任感”。^[8]

林纾也是其中一位。在翻译界,林纾的翻译行为往往被视为一种怪象,有人认为他的小说翻译是不靠谱的作品,不值得一谈,甚至有人对林纾的创作途径以及其作品嗤之以鼻。然而,如果将林纾的创作行为、创作思想以及其翻译的小说置于林纾所处的年代,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林纾是在原作的基础上有意地选择文本内容、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创作,是一种有意为之行为,结果是让原作获得来世(afterlife)。^[9]由于林纾认为通过翻译国外的著作可以达开民智,抗衡欧美列强的目的,因此,林纾广泛翻译东西方书籍,并采用适合于当时知识阶层或阅读所用的古雅文字风格,以宣扬西方文化为己任,来唤起国民的抗争意识。虽然林纾的译作与原作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他翻译的小说因为颇具情趣、别有风格而让民众如获珍宝,因而启蒙了民众的革命思想。

另外,还有一些译者默默地为“一名之立”而“旬月踟蹰”,使译文顺达与文雅,让读者如临其境,

感同身受。“翻译家就像一个社会活动家,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将过去以往、遥远的异邦,推向一个新的时代,新的领地,让人类精神遗产获得新的生命,赋予了新的内涵,得以延续。”^[10]又如,在跨文化商务谈判中,某中资企业想与外国投资企业合作建厂,外方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说了些不文雅的话,中方的负责人忍无可忍,不经意间也动了粗口。在这种情况下,负责人任何的粗口都不能照译。如果照译(如 Son of a bitch, Shit 等),谈判一定不能成功,但如果译为“*We'll think it over.*”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11]在此例中,如果译者不是以企业为重,对说话者不文雅的言辞进行选择性的翻译的话,必然导致谈判失败。以上种种均透析着一种可能,即译文实现忠实目标之后,在走向更高目标,即顺达或文雅亦或顺达与文雅时,译者以高度的责任感“显身”,左右翻译活动和翻译效果,从而实现翻译沟通交流之本意。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译者责任必然是忠实之后时间关系的皈依。

四 译者责任的生成

忠实之后的空间和时间关系都指向译者责任,是译者责任作用于译文,使之忠实、顺达与文雅,实现翻译沟通交流之本意,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促动人类走向文明和谐。然而,译者责任如何生成?作为“人”的译者,其特征、性格、思维和行为等的生成显然离不开其所处的文化、时代以及自身的认知观。作为“人”的译者,译者责任的生成自然也不例外。

(一)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

作为一个社会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总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的影响。译者在处理翻译相关问题时,总会有意无意地从自身所处的国家、地区或从属的民族文化的思考,并选取相应的翻译原则、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以求达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在这一过程中,译者责任随之生成。英语中存在大量与“狗”相关的习语,如:“*Love me, love my dog*”。根据字面意义,翻译成汉语时,它表达“爱我就爱我的狗”之意,但是在多数情况下,“狗”在中国文化中属于贬义词,如:看门狗、丧家之犬、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等。若译者翻译成“爱我就爱我的狗”显然不合适,译者受到自身文化的牵引,应该翻译成“爱屋及乌”,这样既符合汉语语言特点又能避开使用汉语中具有明显贬低意义的“狗”字,容易让汉族人民接受或喜闻乐见。再如,在英语语言文化中对“死”字的禁忌不是那么强烈,常有此类表达:“*He died be-*

fore his wife”“His secret died with him”和“He died for his country”.根据字面翻译,应该分别为:“他比他的妻子死得早”。“他的秘密与他一起死去”和“他为他的国家而死”。但是中国文化中对“死”字十分忌讳。对于“死”往往表达为:去世、逝世、入土、归寂、牺牲、献身或捐躯等等。因此,译者应该有责任将上述三句话按照中国文化习惯翻译成:他先于他妻子而去了。他的秘密与他一同入土了。他为国捐躯/献身了。从上述结果看,正是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促成了译者有责任根据自己国家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进行翻译,因此可以说,文化因素是译者责任生成的结果。

(二)时代因素作用的结果

翻译活动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时代中进行的,译者总是有意无意地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服务,并受其所处时代影响。正如“时代造英雄”一样,时代影响着译者责任的生成。以林语堂为例,他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接受基督教文化教育而又在西方国家生活30余年。不管从他的出生或是教育背景还是生活经历来看,林语堂都是“彻底”的西方国家人士,但是林语堂以其创作和译作有意识地承担起那个时代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使命的重担。究其原因,是时代的力量让林语堂“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12]其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翻译家的责任担当和时代使命。鲁迅先生的例子更为鲜活。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先生为了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秉持“以文救国”之信条,并以“匹夫之勇”,有目的地翻译大量西方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和哲学思想作品,实现了“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目的。鲁迅先生响应时代的号召,有目的有责任地进行了文化和译事创作。

(三)译者认识观作用的结果

在哲学史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观: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前者认为人们依靠感觉和知觉指导一切行为,后者认为世界是由相互对立的两个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物质的,一部分是理念的。^[13]两种认知观将主观的世界与客观的世界截然分开,显然是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将认知归入认识论的范畴,并认为其具有主观能动性。译者责任的生成是译者认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这是因为译者在选取翻译文本、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均体现译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如果译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全面的、整体的,那么译者能形成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并以此价值观指导翻译实践,译文的结果就是合乎情理的,也可以说是负责任的译文。反之,如果译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片面的、局部的,那么

译者就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在翻译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结果是“望文生义”,如:将“media circus”(新闻闹剧)翻译成“媒体竞技场”,将“red tape”(官僚习气)翻译成“红带”,将“开瓶费”(corkage charge)翻译成“open-bottle fees”等都是典型错误认识观作用的结果,是一种不负责的表现。

译文忠实的背后是译者责任必然和使然。译文在实现忠实之后走向顺达、文雅的过程中同样以译者责任为皈依。可见,译者责任深刻地影响着译文的忠实、顺达和文雅,它以一位中间人的角色调和了译文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并在译文的时空中发挥着主观能动性。译者积极正向的主观能动性是译者负责的表现,它促使译者遵循翻译生态的生存规则,推动译学活动不断向前发展。反之,译者消极反向的主观能动性是译者失责的表现,它误导译者破坏翻译生态环境,影响译学活动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2] 贾一村,单宇鑫,贾文波. 应用翻译简明教程[M].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5.
- [3] 陈志杰,易松明. 译者责任的实现[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5):75-79.
- [4] 胡庚申. 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J]. 中国翻译,2014(1):29-35.
- [5] 劳伦斯·韦努蒂. 译者的隐身[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6] 唐健禾. 译者隐身现象与译者的社会责任和价值[J]. 中国科技翻译,2013(4):52-55.
- [7] 黄长奇. 翻译工作者章程[J]. 中国翻译,1996(2):2-5.
- [8] 汪毅夫,严复. 天演论与强化社会结合的凝聚力[N]. 光明日报,2012-03-20(14).
- [9] 杨柳. 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 [10] 周红民,程敏. 论译者隐身[J]. 上海翻译,2012(4):18-22.
- [11] 曾剑平. 论有意误译[J]. 中国科技翻译,2015(3):43-47.
- [12] 冯庆华. 翻译导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 [13] 岑运强. 语言学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